

# 学界展望（语言学）

[日] 秋谷裕幸 桥本贵子 野原将挥 户内俊介  
石崎博志 加纳希美 滨田武志 铃木庆夏 撰  
王 琼 译

## 引 言

“学界展望（语言学）”由日本中国语学会学界展望编辑委员会（委员长秋谷裕幸）负责。

一如既往，本文原则上以2020年1月至12月在日本公开发行的著作以及学术论文为对象，同时也涉及在海外公开发行的研究成果。

研究领域的分类以及执笔人与去年相同。分类包括“引言”“音韵”“文字·训诂”“语法·词汇（上中古）”“语法·词汇（近代）”“语法·词汇（现代）”“方言”“教育”，执笔人按栏目顺序依次为：秋谷裕幸（爱媛大学）、桥本贵子（神戸市外国语大学）、野原将挥（京都大学）、户内俊介（二松学舍大学）、石崎博志（关西大学）、加纳希美（金泽大学）、滨田武志（神戸市外国语大学）、铃木庆夏（神奈川大学）。

本文所用学术杂志略称如下。均为2020年出版。

- |        |                             |
|--------|-----------------------------|
| 《东方》   | 《东方学报（京都）》第95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
| 《中国》   | 《中国语研究》第62号（中国近世语学会）        |
| 《言语文化》 | 《中国言语文化学研究》第9号（大东文化大学外国语学部） |
| 《出土》   | 《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24号（中国出土资料学会）    |
| 《东京》   | 《东京大学中国语中国文学研究室纪要》第23号      |

- 《中》 《中国语学》第 267 号 (日本中国语学会)  
 《人文》 《人文研纪要》第 95 号 (中央大学)  
 《语学》 《语学教育研究论丛》第 37 号 (大东文化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  
 《中教》 《中国语教育》第 18 号 (中国语教育学会)  
 (秋谷裕幸)

## 一 音韵

上古中古方面,吉池孝一的《〈后汉书〉中的阎膏珍是谁?》(《东洋哲学研究所纪要》35)从音韵学观点出发讨论了史学的问题。于《后汉书》中记载为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之子的“阎膏珍”,在1993年发现罗巴塔克碑文之后多被认为是 Vima Taktu;而吉池通过汉字音译的分析,推定“阎膏珍”为 Vima Kadphises。船山彻的《〈出要律仪〉辑佚中所见梁代佛教的音译词》(《东方》)详尽地收集了于梁初编撰而成的作为佛典音义书原型的《出要律仪》的音义辑佚,并对该资料的构造加以考察。虽不是所谓的汉语音韵学研究,但所收集的音义辑佚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汉字音译作为梁朝的梵语学资料、梵语对音有重要意义。

就中古音的音值,吉池孝一、中村雅之著有《中古汉语中浊音的送气特征(1)~(3)》。

至于宋至辽期间,在此介绍反切资料的相关研究。水谷诚《〈类篇〉研究》(汲古书院)收集了作者十多年来《类篇》和《集韵》相关性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收录了论及《集韵》以及多音字“重”等问题的文章。此外,还有丁峰《宫内厅所藏南宋绍兴府华严会刻八十卷本〈华严经〉及其所附卷末音之研究》(《言语文化》)、大竹昌巳《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反切小考》(《KOTONOHA》208),论证了反切资料中所示与之前相关典籍间的继承关系。后者指出希麟《续一切经音义》音注为参照孙愐《唐韵》系统的韵书与慧琳《一切经音义》两书所附,推定其并非为希麟新著。

吉池孝一、中村雅之《汉语近代音与契丹文字汉字音(1)~(8)》(《KOTONOHA》209~216)基于契丹文字资料讨论了中古音至近代音间中国北方出现的入声韵尾消失现象。文章针对契丹文字所标记的汉字音中入声韵尾的有无,在详细探讨前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确认了 p 被保留下来

而 k/t 消失的现象 (但也存在一部分词语保留了 k/t), 同时指出这一情况与北宋《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相同。

《汉字文献情报处理研究》19 (好文出版) 中以《数字时代的中国学参考手册》为题的特集里, 野原将挥的“音韵调查”以极其通俗易懂的语言说明了音韵学的重要概念, 同时介绍了关于上古音的基本研究思路以及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使用网络对中古音、上古音、方言音进行调查的方法以及使用时注意事项的解说都很详尽, 不仅适合音韵学入门学习, 而且对音韵学相邻领域的学生及学者进行诗歌注音释义、外语汉字音译、上古出土资料分析等研究均有参考作用。

在近代音方面, 域外资料相关的研究很活跃。作为使用满洲文字资料的研究, 锄田智彦《〈清书对音协字〉中的汉字音 (1)》(《博雅教育: 岩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纪要》107), 以及锄田智彦《〈满汉西厢记〉中汉字音的标音》(《水门: 语言和历史》29, 勉诚出版) 值得一提。其中前者讨论了较早以满文归纳汉字音的资料《清书对音协字》(17 世纪后半至末期刊行) 中声母标音的特征。内田庆市编著的《南京官话资料集》(关西大学出版部) 影印了三种南京官话资料, 并加以转写以及解题。就所影印资料中, 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所藏 *Dictionarium Latino Nankinense Juxta materiarum ordinem dispositum* (1847, 一说 1857), 葛松在《耶稣会士李秀芳生平及其〈按照主题排列的拉丁语南京话词典〉初探》(《东亚文化交涉研究》13) 的研究中指出, 书名中虽包含了“Nankinense”, 但其实际上所反映的是上海方言。萩原亮《关于中俄对译资料〈华俄初语〉》(《或问》38) 及萩原亮《关于〈中俄话本〉的语言》(《中国》) 研究了 20 世纪初俄中对音对译资料, 指出从资料中可见东北官话以及胶辽官话的音韵特征。

(桥本贵子)

## 二 文字·训诂

首先介绍 2020 年文字、训诂相关的专著。藪敏裕《〈毛诗〉的文献学研究——以与出土文献的比较为中心》(汲古书院) 是使用包含出土资料的各版本以明确战国至汉代《诗经》实际情况为目的的研究。刘海宇、玉泽友基所编的《日本岩手县立博物馆藏太田梦庵旧藏古代玺印》(上海书画出版社) 收录了太田梦庵旧藏的玺印。关尾史郎《河西魏晋五胡墓出土 镇墓

瓶铭与镇墓文集成》（汲古书院）对河西地区（也包含一部分河西以外地区）出土的镇墓瓶铭文加以释文及解读。训诂方面可关注渡边义浩主编《全译论语集解》上下卷（汲古书院）以及岩本宪司所著《中国古典翻译的诸问题》（《汲古选书》77，汲古书院）。前者对何晏的《论语集解》附以注释、汉文训读、日文翻译，后者涉及古典翻译的相关问题。此外，1984年讲谈社学术文库所出版发行的大庭修《木简学入门》由志学社再版发行，作为木简学的入门书值得关注。

定期刊物与往年相同，出土资料中所见文字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很多。《出土》与往年相比刊登论文数有所增多，内容也更丰富。片仓峻平的论文《以清华简为中心的楚简用字避复考察》就古文字资料中所见避免同字重复的“避复”现象加以严密的论证，积极地对“避复”的出现动机提出了新的见解。苏建洲的《“趋同”还是“立异”？——以安大简〈诗经〉“是刈是穫”为讨论的对象》以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所见《诗经》的异文为例，从文字的历史变化、义通换读（同义换读）的视角尝试释读，不失为一篇佳作。陶安《岳麓书院秦简〈为狱等状四种〉第二类卷册案例十二和十三释文、注释及编联商榷》在《岳麓书院藏秦简（叁）》（2013）刊发之后的讨论观点的基础上，对简牍释文与编联再一次进行了探讨。

大阪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中国研究集刊》66 所载井上了《关于〈穆天子传〉的后代性》研究探讨了相传为西晋时期汲郡战国时代魏襄王墓出土竹书《穆天子传》的成立。文章就《穆天子传》中的用语进行了探讨，指出虽然《穆天子传》中出现的穆王重臣（毕矩、井利、毛班）也见诸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但书中还可见秦汉以前不可能存在的词汇。菊池孝太郎《中国古代楚地鬼神观的考察——以上博楚简〈鬼神之神〉〈凡物流形〉为线索》，以描述楚地“鬼神观”为目的，在论文中作者同时对上博楚简《鬼神之神》和《凡物流形》加以译注。鸟羽加寿也《为了阅读安大简〈诗经〉——〈诗经〉相关文献提要（一）》介绍了2019年公开的《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的相关文献。同时，虽未在2019年的展望中涉及，《中国研究集刊》65 中的福田哲之《水泉子汉简七言本〈仓颉篇〉再考——七言本成立的背景》、鸟羽加寿也《上古汉语声调中的地域时代差——特别关于去声和入声的分类》，以及椛岛雅弘《关于银雀山汉墓竹简的相关新信息——山东博物馆学术调查报告》也不失为有价值的信息。另外，《中国研究集刊》自第66号起完全转为电子版。同样是2019年的研究还有《立命



馆白川静纪念东洋文字文化研究所纪要》12 中的张莉（出野文莉）的《白川静的中国甲骨学研究》。

立命馆大学白川静纪念东洋文字文化研究所《汉字学研究》8 中，除“金文通解”以外新增了“甲骨文通解”，其论文为落合淳思的《河南安阳市殷墟大司空村出土刻辞牛骨》。“古文字学研究文献提要”中所列复旦大学陈剑教授的研究论文，也一如往年颇受重视关注。

此外，作为对用字的差异以及称呼的不同等多样化视角下文献背景的讨论，还有金卓的《清华简〈越公其事〉的文献形成初探——兼论竹简排列问题》（《东京》）。

出土资料的译注，包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76 和 177 中小寺敦的《清华简〈晋文公入于晋〉译注》及《清华简〈子犯子余〉译注》，此外还有《东方》中秦代出土文字史料研究班的《岳麓书院所藏简〈秦律令（壹）〉译注稿其（三）》，《出土》中李筱婷的《清华简〈赤鸩之集汤之屋〉译注》。作为出土资料研究基础的译注编写呈现一派胜景。

（野原将挥）

### 三 语法·词汇（上中古）

首先关于图书，佐藤进、小方伴子所编的《汉学和日本語》（《讲座 近代日本和汉学》第 7 卷，戎光祥出版）中收入了由多位作者执笔的汉语汉文相关的概论类文章。

其次介绍论文。雷塘洵《古汉语动词“假”“借”的音义、句法及其演变》（《中国语学》266，2019）为与四声别义相关的双及物动词的讨论，2020 年获中国语学会奖励奖，现今他仍致力于此方面研究。雷塘洵的《上古汉语“告”的音义、句法及其演变》（《语言学论丛》61，2020）指出，去声读法的“告”（或“诰”）表示“训告、告诫”之义，另外，入声读法的“告”，在需要用“于/於”引出间接宾语所表达的言说对象时，表示祭祀以及外交礼仪的“礼告”；而间接宾语不需用“于/於”引出时，表示一般言说行为的“言告”。该论文对用例及其注释展开了细致的探讨，极具说服力，同时雷氏的一系列研究也涉及四声别义中所见派生交替是否来源于承担上古语法功能的词缀的问题，其后续进展值得期待。“告”还构成使用

“于/於”指示表达内容的“告+间接宾语+于/於+直接宾语”结构,相关内容可参考宫岛和也的《浅谈〈逸周书·皇门〉“开告于予嘉德之说”以及相关问题》(《东京大学中国语中国文学研究室纪要》22,2019)。

邵琛欣《先秦时期汉语“以”字工具短语语序的动词选择倾向》(《东京》)也是双及物动词相关的论文。先秦时期汉语的工具介词“以”用于前置型“以NP+VP”和后置型“VP+以NP”两种结构形式,动词有时使用“假、授、教、告”等双及物动词。迄今为止,这两种表现形式的区别多归因于语用因素,邵氏通过对传世文献的全面调查,论证指出,动词的语义类别制约了“以”字工具短语语序选择——前置型更倾向于选择动作动词,后置型则更倾向于选择表达动作过程/结果的动词。邵氏近年来积极着眼于工具介词相关的研究,2019年还发表了《汉语工具介词的语法化路径及其类型学意义》(《语言学论丛》60)。

三村一贵《关于上古汉语的情态标记“盖”——其中心功能》(《中》)将上古汉语的副词“盖”看作情态标记,同时认为其本质功能在于表达说话时对过去发生事情的真伪判断持保留态度,有时也在语用上派生出礼貌功能。“盖”在迄今的研究中多被认为与传闻的言据性相关,以及表达了说话人的高确信度,而本文作者指出这些并非“盖”的中心功能,前者依存于语境,也就是说传闻中所具备的过去指向性、非直接经验性仅包括在“盖”的中心功能中,而就后者而言,对确信度无所言及才是“盖”的特性。

高柳浩平《关于中古早期的新兼语式》(《人文》)讨论了上古到中古时期所见“动词1+宾语+动词2/形容词”的句式。一直以来就此句式存在两种说法,一说为动词与补语由宾语隔开的动补结构,一说是由兼语式(即使动结构)发展而来的新兼语式;高柳氏在仔细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后者更为合理,并在强调了“动词2/形容词”的强独立性的同时推断出新兼语式成立的两类过程。对该结构的论证,不仅涉及结果补语,同时与上古使动用法的衰退以及非宾格动词的不及物化、清浊别义的消长、汉语由综合语到分析语的类型变化等多方面问题相关,值得探讨的问题无穷尽。

户内俊介《海昏侯墓出土木牍〈论语〉初探》(《出土》)为关于海昏侯汉墓出土的木牍《论语》的初步研究,文中以文字的字体、语法特征为线索探讨了文本间的异同和继承关系,同时对上古词汇、语法加以考察。在第5节中,本来作为否定副词的“毋”在木牍《论语》中作为否定动词

使用,以此为据本文将木牍《论语》定位为反映前汉中期用字法的文本。在第7节中,立足于今本子罕篇“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与木牍本“有鄙夫问乎,吾空空如也”的异同及第一人称代词“吾”和“我”的句法分布,本文认为,“空空如”的主语为“吾”即孔子,同时历代注疏中颇有争议的“空空”为“没有知识”之意。

最后,译注方面,山田大辅著有《阅读佛教汉文(四)——〈百喻经〉卷第四校注训译稿》(《火轮》41)。《百喻经》反映了5世纪末的口语,其中频繁可见与现代汉语共通的语法现象的萌芽。本译注不仅对此类语法现象进行了解释,而且搜罗了尚无定论的词语在其他文献中的用例及词典的释义说明,确定了字句的含义。

(户内俊介)

#### 四 语法·词汇(近代)

以宋代到民国时期为对象,在此分类概述“白话资料”“满汉资料”“域外资料”如下。

吴兰《汉语被动标识的语法化》(《中》)就被动标识“被/给/叫/让”的使用限制,利用理想认知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进行了历史分析。文章认为,“被”从直接接动词的短被动句形式(short passive),扩张为后接施事的长被动句(long passive),结果被聚焦;“给/叫/让”的被动用法由授予动词或兼语动词的使役用法拓展而来,“给”聚焦于对某个行为放任的结果(Naru型),“叫/让”则对应动作对象所发生的状况(Suru型)。综上所述,不同被动标识对句子结构的限制多少继承了其原有结构的限制。千野万里子《关于叶圣陶的语言(3)——作品修改和普通话,以表达禁止、劝阻的词为中心》(《杏林大学外国语学部纪要》32)作为关于叶圣陶如何将其使用下江官话所著《稻草人》修改为普通话的一系列论文之一,指出其将表达委婉性禁止劝阻的用法的“不要”换为“不用”,同时作品中没有采用单音节的“甬”以及“别”,这点有别于《骆驼祥子》。

满汉资料方面,出版了竹越孝、斯钦巴图编《〈一百条〉系列诸本综合对照文本(I)》(好文出版)。该书取满语教材《Tanggū Meyen(一百条)》第1章至第25章,作者费心倾力,逐句对照了满语、蒙古语、汉语、英语的诸译文。

以下将中国境外编纂、使用的资料统称为“域外资料”，按“唐话、日本资料”“朝鲜资料”“泰西资料、译语”的顺序依次介绍。唐话、日本资料可见如下两篇。木津祐子《关于唐通事的官话教材〈三折肱〉》（《语言接触研究的最前线》，Junius）指出，作为唐话教材使用的医学书《三折肱》在文体及结构上与《琼浦佳话》存在共同特征，且长崎唐通事使用医学教材旨在同时习得语言与医学知识。借鉴于琉球的官话学习旨在其与“教诲”同时习得，此结论可归结于唐话和琉球官话之间的互动。杨璇《〈士商丛谈便览〉中清末北京话语法的研究：与〈儿女英雄传〉的比较》（《语学》）将北京人金国璞的《士商丛谈便览》（1901~1902）中的语法与藤田益子的《儿女英雄传》（1878）中的语法研究成果加以对比论证。文章指出，两书均以北京话写成，然而，《士商丛谈便览》中可见对文言以及满族相关词语的回避，在被动句中不使用“被”而使用“把”。这一不使用“被”的倾向同时也出现于金国璞的《北京官话〈今古奇观〉》。

朝鲜资料方面出版有竹越孝的《〈老乞大〉四种版本对照文本》（《神户市外国语大学研究丛书》63）。该书将朝鲜半岛官话教材《老乞大》的4种版本以句为单位对比罗列，可以概览旧版本类型和新版本类型的修改过程。在此基础上，徐小茜在《〈老乞大〉四种版本中的“知道”类动词考察》（《中国》）中考察了实词动词“知道”的变迁，结论指出在“知道”类各词逐渐向“知道”一元化的过程中，本为“知道”之义的“理会”转化为表达可能范畴。

至于泰西资料方面，千叶谦悟的《何盛三的汉语认识——立足日本所见20世纪前半的“官话”及其变化》（《近现代中国与世界》，中央大学出版社）指出，北京官话以及南京官话此类“地名+官话”构词在19世纪的本土资料以及欧文文献中几乎不曾出现，“北京官话”这一称呼产生于日本，以及何盛三早在其各类著作中就曾论及官话包含地理变异、阶级变异以及标准变异的诸多方面。2020年发表了多种罗伯聃（Robert Thom）的相关研究，除了收录有罗氏译本《正音撮要 Chinese Speaker》（1846）的沈国威编《西士与近代中国：罗伯聃研究论集（研究与影印）》（关西大学出版社），还有大岛吉郎著《〈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常用动词辨识初探——以动词重叠式和“把”字句为中心》（《语言文化》）。后者将当时的口语常用动词对比《儿女英雄传》《红楼梦》并加以考察。此外，内田庆市、田野村忠温编著的《〈华英通语〉四种——解题与影印》（关西大学出版社）在新



出资料《华英通语》道光本以外，还收录了罗伯聃的《华英通用杂话》(1843)。

域外资料中陆续出版了新资料以及珍本的影印与研究，最后罗列如下并加以总结。唐话资料方面，岩田宪幸的《〈三字唐话〉的研究 基础资料篇》(白帝社)校订了九州大学图书馆石崎文库以及国文学研究资料馆所藏的两种版本。泰西资料方面，内田庆市的《南京官话资料集——〈拉丁语南京话词典〉及其他两种》(关西大学出版部)收录了虽在书名中称为“南京话”但实际为上海方言的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所藏 *Dictionarium Latino Nankinense* (1847, 一说 1857)。

(石崎博志)

## 五 语法·词汇(现代)

关于语法研究，在此首先介绍立命馆孔子学院所编《“初级汉语语法”及之后的汉语语法》中所刊登的论文。该书基于“现代汉语讨论班 2018”的内容，在介绍讨论班讲师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同时，向从事汉语教育者提议再次构建汉语语法体系以及将研究成果运用于实际教学。杉村博文在《可能补语肯定式的用法》中讨论了可能补语的肯定式。关于可能补语否定式所具不可能含义的表达原理，大河内康宪著有《汉语的可能表达》(《日本語教育》41, 1980)。杉村氏在此基础上重新考证肯定式的可能含义，提出了其独到的见解，他指出可能补语结构中的“得或不”作用于动补结构的状态化，并不具备判断是否达成或实现的认识论功能。其立足于细致的实际用例分析的一系列严谨论述，不仅为表情态性可能的“能”与可能补语肯定式共现的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同时在可能含义的本质及其表达原理的阐明上也极具启发性。木村英树在《思考汉语疑问词——其一》中主要论及疑问词“什么”“谁”“哪个”的对立，并提议对其体系进行修改。通过在各方面设定三个参数，如语义场中“范畴/个别或具体事物/人物”，语义功能上“标示列表清单的要求/指定对象的要求/描述属性的要求”，文中明确了下面两者的不同：区别于“谁”要求指定个别(人)，疑问词“什么”要求指定范畴。此外，其还指出询问个别或具体事物的疑问词的缺失，更就其原因提出广泛适用于一般语言的极为重要的见解：在求解时的探索领域中，关于“人物”其存在以个体为单位的知识储备，而关

于“事物”并不存在，此乃原因所在。同一作者的《思考汉语疑问词——其二》条理清晰地点明“什么样”“怎么样”等其他疑问词也可在《其一》所述的框架内加以解释。关于“几”和“多少”的本质性区别，在汉语的实际教学中其说明多流于表面，而文中明确归纳指出“几”所问数为“指定”，“多少”所问量为“描述”，疑问词的功能差别在于数和量的功能差别。该文可以说不仅对于疑问词研究，对数量表达方式的研究来说也富含启发性的真知灼见。

接下来介绍定期刊物中的研究成果。小野秀树的《现代汉语中形容词的状语功能》(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语言·信息·文本》27)多方位地考察了修饰动词的形容词的语义和功能，并对前人的研究加以修正，文中指出单音节形容词作状语直接修饰动词的AV型结构中，仅无标记时与其句式上的平行结构即作定语的名词修饰AN型结构相同，具有分类功能。另外，AV型结构以外的修饰结构中，各类形容词所具功能仅限于(现场)描写，文中指出，例如双音节形容词的A<sub>2</sub>地V结构，与其句式上的平行结构即名词修饰A<sub>2</sub>的N型结构不同，并不具备(认知)描写和限定功能；文中将其归因于对被修饰动词所表达的“行为”的认知上的特性。潘海华、陆烁、陈信杰、芦大鹏《汉语形容词复杂形式的语义属性和句法表现——综合南方四地方言之讨论》(《中》)基于中国南方四地方言的语料，从类型论的角度分析了不同格式的状态形容词(“雪白”“白白的”“很高”“老老实实”等)的语义，同时其将一系列的结构作为词组分析，从而尝试就该形容词的句法特点、程度、主观性等相关语义特征给予统一的解释。王峰《语气词“呢”的人际互动功能》(《中》)将说话人或听话人对某一命题事件的认知或情感状态的预设定位为“语用预设”，并在此基础上总结，语气词“呢”在特指疑问句、“NP+呢?”问句、陈述句等各类句式中存在凸显此类主观性、交互主观性相关预设的功能。文中还指出，该功能特点缘于听说双方达成认知上的共识或建立交际上的协作，而一直以来被看作“呢”自身所具有的“对比”以及“缓和语气”等功能，其实来源于“呢”所诱发的“语用预设”。陈玥《论“V着”句与“V起来”句语义功能的差异》(《中》)通过对“NP<sub>受事</sub>+V起来+AP”(如“这话听起来有些刺耳”等)与“NP<sub>受事</sub>+V着+AP”(如“这话听着有些刺耳”等)加以比较，指出相对于前者倾向于表示事物的属性并可用于对未然事态进行预测，后者则倾向于表示通过知觉体验感知到的事物性状。同时，论文从动作性

强度、时态特征等多个角度详细说明了两句式的差异, 并分析指出, “V 起来” 句转为 “V 着” 句时所受限制也起因于这一系列的差异。

单行本方面, 出版了雷桂林的《汉语数量表达前置句式的语义功能》(东方书店)。书中就“数词 + 量词 + 名词”等结构的数量表达, 探讨了其功能与各类句式中所处位置的关系; 该书以作者博士论文内容为主线, 同时囊括了其新的研究成果。例如, 雷氏在 2009 年获得日本中国语学会奖励的研究中, 明确了以“两个留学生来到了我们班”为代表的“无定名词主语句”的场景描写功能, 而本书进一步着眼于场景描写的感知方法, 将该句式结构定位为比存现句主观性更弱的表达方式。

词汇研究方面介绍如下两篇。中川正之的《日中对照语言学的视角》(立命馆孔子学院编《“初级汉语语法”及之后的汉语语法》)就词汇和语法相关的多个话题从对照语言学的角度展开了多方面的讨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表工具名词的考察研究。日语中, 工具可两分为: 如“湯呑み(茶杯)”和“黒板消し(黑板擦)”这种可看作直接参与了动作的类型[比如, “湯呑み”可以看作茶杯喝(“呑み”(茶)水(“湯”)], 以及如同“靴べら(鞋拔)”这种仅对动作行为起辅助作用的类型。该论点作者早在汉语与英语的对照研究中就已提出(《物(mono)与事(koto)的日中英对照》, 神奈川大学中国语学科编《对于现代汉语的视点》, 东方书店, 1998), 在此再次言及并指出将这些个别分析研究的词汇体系化的可能性。彭广陆在《关于“外国语”“外语”以及“外国語”“外語”》(爱知大学《日中词汇研究》9)中, 就表示“外国的语言”的汉语“外国语”“外语”和日语“外国語”“外語”, 基于语料库调查客观地讨论了其词源、使用情况以及对应关系等方面。论文通过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观点出发展开全面分析, 发现“外语”虽在出现时间上晚于“外国语”一千多年, 但现在其使用频率远高于“外国语”, 并已作为与日语“外国語”相对应的词固定并普及开来。同时, 作者还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双音节化这一现代汉语的词汇特点。

(加纳希美)

## 六 方言

此类中利用前人研究报告语料以及文献资料的研究很多, 首先介绍个

别方言的研究。藤原优美在《关于成都方言中“得”的句法功能》（《广岛国际研究》26）中，围绕成都方言的“得”在总结了其各类用法的基础上讨论了其与普通话句法上存在的异同。郑雅云在《台湾华语中助动词“yǒu（有）”所具有的句子时间性解释》（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语言记述论集》12）里指出，在助动词“有”与动态动词共现的例句中，存在有界性（telic）动词句可以解释为表达属性的例子，同时文中还指出，在表达未来事态时，台湾华语与客家话或台湾话可能存在“有”的使用条件上的差异。渡边俊彦在《关于台湾华语句首的“啊（ah）”》（《拓殖大学语学研究》142）中将台湾华语的句首语气词（相当于文言文的发语词）看作来源于闽南话（台湾话）的要素，但他同时提出，不应仅把句首语气词看作移位的结果，而应作为已固定存在的语法现象之一。语法现象相关的研究以外，张盛开的《平江各地客语词汇对比研究》（静冈大学言语学研究会《静言论丛》3）调查了湖南省平江县内三地及县外三地（梅州、桃园、台中）的客家话词汇，其调查结果表明，平江县内的客家话确实同质性较高，然而其中包含大量来自同县赣语的借词。

作为基于文献的方言研究，远藤雅裕在《论六十年代台湾客家话课本〈新客话课本〉的特点》（《中央大学论集》41）中介绍了1962年天主教华语学院（新竹市）出版的客家话教科书资料《新客话课本》，同时阐明从音韵、词汇、语法的分析结果来看，该书应基于台湾客家话海陆片。川澄哲也在《关于陕北山歌〈信天游〉中的第一人称代词“奴”》（松山大学《言语文化研究》39-2）中指出，陕北地区的山歌（民谣）《信天游》里的不在口语中使用的第一人称代词“奴”，与在近代汉语中一样，明显倾向于由女性（特别是已婚女性）使用。任菲在《〈活用上海语〉中罗马字注音的语音研究》（《语学》）中通过大川兴朔《活用上海语》（1924）的注音复原了20世纪初上海话的语音系统，并讨论了其特点。去年未及介绍的张盛开《关于平江方言韵编〈又一经〉》（静冈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部《亚洲研究》14，2019）校订了湖南省平江县方言韵书《又一经》的四种版本，并指出该书为以基于平江方言词汇及音韵的韵书为框架的谚语集，同时否定了该书作者为乾隆时期的平江县贡生李映奎这一旧观点。

历时研究方面，大西博子《吴语中的入声舒化——以其变化过程为中心》（《近畿大学教养外国语教育中心纪要（外国语篇）》11-1）在综合分析了吴语入声音节中出现的调值、音长、音值变化的基础上，指出入声舒



化的发展因地域不同而顺序不同。远藤光晓《调值的双向变化：来自汉语的证据》(*Bidirectional change in tone: Evidence from Chinese*, 青山学院大学经济学部《经济研究》12) 基于19世纪到21世纪所著11种变异的报告中所示37类调值变化模式, 分析指出调型间的变化可以是双向的, 并对单向变化假设的声调环流说提出反证。另外, 虽为国外的报告, 秋谷裕幸在《闽语中早于中古音的音韵特点及其历时含义》(《辞书研究》2020-5) 中总结了闽语早于中古音的六种音韵特点, 并指出闽语可以用上古音时期以后的创新语音演变来定义, 同时, 以这种共享创新为依据可推断闽语和吴语处衢片源自同一个原始语, 文中还主张, 在视闽语所有音韵对应为上古音系的反映这一点上需持保留态度。

方言地理学研究方面, 在此介绍岩田礼的《汉语方言中词汇变化的特点: 类推的作用》(公立小松大学《国际文化》2)。文中使用各时期文献资料中的词语用例, 对时间词“大后天、大前天”的词首“大”的成因, 以及表示“夜”的词“晚上”和“夜里”同时存在的原因, 提出最新假说并加以佐证, 作者同时指出, 高频率出现由类推以及牵引所产生可论证性的现象或可作为汉语的特点。

方言文字化相关研究方面, 在此介绍吉田真悟的《台湾话语言景观中的文字使用》(《日本汉字学会报》2)。该研究笔记将台北和台南城市街区中所见台湾话用字的实例加以分类, 并进行了分析。

(滨田武志)

## 七 教育

2020年的有些论文展现了今后汉语教育研究发展的可能性。首先在此介绍以2019年汉语教育学会全国大会上的演讲为基础的两篇报告。

杉村博文《汉语教师应该知道的汉语语法知识》(《中教》) 与以往论著着重于教学中针对个别语法现象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的做法不同, 作为教师应了解的语法知识, 文中论述了共通于个别语法现象的汉语根本问题。作者指出, 汉语具有单音节语的特点, 句中的词没有反映语法关系以及语法范畴的形态变化, 因此在汉语语法结构的基本设计上, 可以将汉语类型学上的各特点合理定位为: (一) 语序和虚词(功能词) 为基本语法手段, (二) 主题优先型句法为基本句型结构, (三) 以意合法为宗旨,

(四) 在 SVO 结构中, 谓语前部为开放的, 谓语动词与宾语间是半开放的, 宾语后部是封闭的。其观点“通过了解学习中的语法与已学语法如何相关, 以及对今后要学习的语法提供什么样的线索, 可以期待更效率的语法教育”, 对于接触自发学习积极性较高学生的教师来说极具启发性。

对汉语的理解及知识方面以外, 汉语教育研究也着眼于学习者在汉语习得过程中的各类现象。如后述内容所示, 日本国内的汉语教育研究中, 日语母语者作为第二语言学习中文时的调查研究占绝大多数, 而在此趋势下, 高桥朋子在《外国居民对日本社会所求——对中国裔儿童的汉语教育》(《中教》) 中讨论了作为母语的汉语教育, 更具体来讲, 是作为继承语 (heritage language) 的汉语教育的重要性。文中就中国裔儿童的语言教育现状, 提及家长和孩子苦于没有沟通交流时使用的共通语言的事例, 以及汉语与日语均无法如母语者一般灵活使用的“双限型” (Double-limited) 事例, 同时讨论了生长环境、语言环境的多样性 (是否在日出生, 幼儿期来日还是学龄期来日, 成长时是否频繁往来于日中两国, 是否在日中以外国家长大, 双亲各以何语言为母语, 家中使用何语言等) 以及语言能力的多样性等相关课题。

下面介绍的两篇论文针对一直以来很少甚至几乎不曾作为教学项目研究的现象。

单艾婷在《从衔接的观点来看汉语中高级学习者的偏误——着眼于连词性指标》(《中教》) 中提及, 词汇与语法多在单句中学习, 而学习者对于句子之间的衔接以及语篇衔接整体的理解并不充分, 语篇层次上的衔接相关的教学法并未确立; 该文调查了 61 名中高级水平学习者连词的使用情况 (缺漏、混淆、误加), 作为降低日语表达方式影响的对策, 提出如下建议: (一) 日语“テ形”及连用形所示累积关系表达时最好追加使用连词性成分 (例如: “私は将来沢山の外国人が日本に来て、日本を好きになってほしい。”表达为“\*我希望将来有很多外国人来日本, 喜欢日本。”但更好的表达为“[……], 并且喜欢日本”); (二) 日语中具开场白功能的“が”等; (三) 日语中多仅用于前句或仅用于后句的连词性指标, 在汉语表达时应促使学习者组合使用 (例如: “爆買いには良い影響があるが、問題もある。”表达为“\*虽然爆买行为有好的影响, 也有问题。”但更好的说法是“[……], 但是也有问题。”) 等等。

张婧祎、玉冈贺津雄、胜川裕子在《日本汉语学习者对停顿及重音的

韵律理解》(《中教》)中提到,如“他拿了封信出来交给我”,据停顿(pause)位置不同,其含义可不同地解释为“他[拿了封信][出来交给我]”和“他[拿了封信出来][交给我]”;另外,如“我想起来了”,据重音(tone stress)位置不同也会得到不同的语义解释,即“我想起来了”和“我想起来了”。就此类现象,作者聚焦于42名中级学习者能否听出这些歧义句的区别,通过对词汇得分、声调识别得分、停顿判断得分、重音判断得分、短会话听力理解得分、长会话听力理解得分等7个独立变量进行层次聚类分析,指出(一)对停顿的理解可以得到提高,但对重音的理解很难得到提高;(二)对停顿的理解能力强的学习者对单句的相关理解十分优秀;(三)对重音的理解力强的学习者倾向于具备较高的产出能力以及长会话听力理解等语篇层次的能力。

(铃木庆夏)

[译者单位:帝京科学大学综合教育中心(非常勤)、  
国士馆大学法学部(非常勤)]